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

费振钟 著

分離的價值



鳳凰出版社

里下河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也有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他们思想深厚，文采斐然，才情横溢，不仅体现出一种文学性与理论性交融的特征，而且深度彰显了里下河文学评论家共通的人文气息和品格。



黑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

分離的價值

费振钟 著



鳳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分离的价值 / 费振钟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7.9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 / 刘仁前主编. 评论卷)

ISBN 978-7-5506-2648-5

I. ①分… II. ①费…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7171号

- | | |
|---------|---|
| 书 名 | 分离的价值 |
| 著 者 | 费振钟 |
| 组 稿 | 泰州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责 任 编 辑 | 常宁文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印 刷 | 泰州市隆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夹河路50号
独立车间:海陵区苏陈工业园区南园区,邮编:225300 |
| 开 本 | 718×1005毫米 1/16 |
| 印 张 | 159 |
| 字 数 | 2681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648-5 |
| 定 价 | 450.00元(全12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23-82225559) |

写在前面

自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已陆续出版有《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提供了良好而详备的资料。第五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召开在即，我们专此出版《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冀望通过对里下河文学评论家评论作品的系统汇集，扩大和丰富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的阈限与特质。

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仅有全国著名的文学创作代表人物，还有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这与里下河历代文人重视经史文章诗辞歌赋研究息息相关。这里不仅有名重我国古代哲学史的泰州学派，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还有中国本土经典文艺理论家刘熙载等先贤名家。显然，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和文艺理论基因，培育了当代里下河文学评论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展开，里下河文学评论呈现出井喷局面，从中涌现出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评论家，形成了以叶橹、黄毓璜、丁帆、朱晓进、费振钟、王干、汪政、晓华、王尧、吴义勤、温潘亚、何平等一批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评论家方阵，成为推动里下河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作为文学流派的内部现象，在国内文学界并不多见。

里下河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也有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他们思想深厚，文采斐然，才情横溢，不仅体现出一种文学性与理论性交融的特征，而且深度彰显了里下河文学评论家共通的人文气息和品格。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分单集与合集两类，收入 27 位评论家的文学评论作品。具体分为：

单行本 9 卷，为：

叶 橹评论集——《形式与意味》

费振钟评论集——《分离的价值》

王 干评论集——《江苏作家论》

汪 政评论集——《言说的历史风景》

晓 华评论集——《华丽家族》

温潘亚评论集——《忧思随草绿天涯》

姜广平评论集——《穿越与抵达》

吴义勤评论集——《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

何 平评论集——《无名者的生活》

合集分3卷,书名为《在场者的言说》,共收入里下河地区陆建华、陈歆耕、孙建国、陈义海、刘满华、徐可、孙生民、北乔、孙曙、陈军、陈永光、吴萍、严勇、陶林、周卫彬、卞秋华、易扬、汪雨萌等18位评论家的文学评论作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原拟选入丁帆、王尧等几位评论家评论作品,但作者意见避免重复出版,对此我们表示尊重,不再刊版。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于泰州

目 录

写在前面 /001

第一辑

写在水上

——汪曾祺论 /002

寂静之美

——汪曾祺的精神自观 /011

语言的策略

——论陆文夫、高晓声小说的叙述风格 /020

迟开的蔷薇

——评叶至诚散文的“有我”品格 /031

第二辑

一个观念小说作家的想象

——评周梅森“战争与人”系列小说 /038

不再为了期待

——黄蓓佳：抒情诗时代结束以后 /049

非战争经验的叙述

——关于朱苏进小说创作发生的

假定性判断 /061

分离的价值

——范小青近期小说论 /071

1985—1990:作为技术性小说作家的叶兆言 /082

挽歌为何而唱

——苏童、叶兆言的“怀旧”小说 /094

迟子建的童话:北国土地上自由的音符 /102

寻梦者恪守的田园

——再读李贯通 /111

钟山短论:阿城、储福金、何立伟、贾平凹 /117

第三辑

晚秋作物

——张学诗的乡土散文 /124

地方知识的文学书写

——读刘春龙《乡村捕捞散记》 /126

因为父亲的引力

——读陈社散文集《艰难的父爱》 /129

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慰藉

——再读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 /135

坠落之处皆为尘埃

——《荷尔蒙夜谈》的解释学阅读 /142

回归语言之乡

——董维华《洼地》读片 /147

第四辑

毛家旺著《泰州方言例解》叙 /152

序《港口竹枝词》 /156

吴双林《汲古集》叙 /158

只因孤蒲写本事

——金实秋《孤蒲深处说汪老》序 /163

握农具的手

- 序刘金祥《兴化农事》 /166
方培力著《泰州菜品》叙 /169
姜楠著《古典的浪漫的》叙 /171

第五辑

传统文人精神的当代意味

- 与王晓明对话 /174
“文学已进入到一种后小说的时代”
——与姜广平对话 /183

第一輯

写在水上

——汪曾祺论

《逝水》首篇《我的家乡》里，汪曾祺这样讲他与“水”的关系：

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退了机票，推迟了行期，希望和我见一面。她翻译过我的几篇小说。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

这篇标题为“我的家乡”的文章，以“水”作主题，是颇有深意的。古运河漫漶过秦邮故地，汪曾祺枕着运河的柔波度过他的儿童少年时代。水，成了灌注他生命的永恒力量。它是他人生的源头，又是他人生的归宿。当他意识到，需要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一次诗意总结时，“水”作为确定的故园意象，便成为他反观自己生命过程的最重要的比照之物；而且在他终于进一步意识到“水”在构成自我生命活动中所具有的精神涵义时，他对于“水”的领会，则更带有“生存论”的哲思色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样的亲切，又这样的怅然地望着它远逝而去。所以，汪曾祺在漂泊半个世纪，思求安定闲适的精神家园之际，用“逝水”二字，对“此身所在”作一规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水”远远流逝而去，但它却与个人生命的源始愈加接近。当然这并非来源于某个现代哲学观念，而是仅仅出于一位艺术家的感受。对汪曾祺而言，在他走进耄耋之年，“水的感觉”所给予他的生命的泽润，使我们知道了他所追求的寂静之境，为什么能够“寂”而不枯、“静”而不晦。说来，像安妮·居里安这样的外国汉学家，无论她的艺术直觉多么准确，但恐怕仍然难于弄清楚一位东方艺术家最终在精神上的皈依于“水”的文化心理内涵。这就如同《我的家乡》因为写“水”，居然意外得到世界环境组织的奖励一样，相信他们绝不会是因为理解了它的写作者寓于其中的“生”的眷顾和臆求的。

也许,汪曾祺对“水”的依存,是出自本能的单纯意愿。在他之前,如他的老师沈从文,以及他颇为心仪的周作人,都曾经强烈地产生对“水”的本能的依赖,分析起来,自然都因他们的“根”在“水边”的缘故,但不管沈从文抑或周作人对汪曾祺发生过多少影响,也不管他们在自然气质方面原本是多么融通,然而,汪曾祺在本世纪末对“水”的“寻根”,其意义是相当独特的。这表现在,首先汪曾祺对“水”的意识,逾越了自然欲求的境域。即他并不是把“水”作为一般的自然对象,借助于“审美”,表达一点简单的情感冲动——看起来,他对“水”的意念,是与乡土的怀想混合在一起的,要仔细分别它们之间不同的层次,确实不太容易,不过有一点都比较清楚,汪曾祺非常明白他是在与“水”的依存关系中确认了“水”对他的精神性格的滋养,或者说是“水”养“活”着他。这里更多地反映了他对个人生存性质的体察,而不是满足于那种表层的怀乡者的抒情需要。其次,逾越了个人的“思”的境域。也就是,汪曾祺意识到的“水”,已不仅仅作为与人的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形态,被“鉴戒”,被“评价”,而是作为对人的姿态性的“规范”,从而具有更为普遍的、客观的精神文化价值。恰恰由于后一点,汪曾祺与“水”的关系,使我们想到了“知者乐水”这个相当古老的说法。根据这个说法,我们不能不对始终与“水”渊藪相关时江南文人投以现代人的一瞥:江南文人的“知”性,不是被“水”养育出来的吗?说真的,很长时间以来,不知是“水”疏离了我们,还是我们疏离了“水”,总之不知何故,在现在的江南文人身上已经差不多闻不到“水”的气息了。假如没有汪曾祺今天这么清晰地表示归投于“水”的意愿,那么我们真的几乎没有机会知道“水”为何有之物了吧。

还是在《我的家乡》这篇短文里,汪曾祺告知我们,说:

……运河是一条悬河,站在河堤上,看到几只野鸭贴水飞向东。河里有大船,撑篙的男人因为长年注视着流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还有打鱼的热闹场面,看打鱼的,鱼鹰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的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还有“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看到不断有成队的水牛在大堤上慢慢地走过去,于是想象湖西是一片碧绿碧绿茭草。……湖中有神珠,沈括《梦溪笔谈》曾有记载,以此亦称珠湖。……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淼淼(湖上常常没有一只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枯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浓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他说)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听到一个女人高亮而悠久的声音:“二丫头……回来吃晚饭来……”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水

乡极富水产,然而(他又特别郑重地说),我们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县里的名胜古迹最出名的是文游台。这是秦少游、苏东坡、孙莘老、王定国文酒会之所,登台回望,眼界空阔,我小时常凭栏看西面运河的船帆露出半截,在密密的杨柳梢头后面,缓缓移过,觉得非常美……

这就是水之为“水”的意蕴幽邃之处了。汪曾祺所以从心底发出“圣境”的感叹,是因为他处身此中,感到了一种引导着自己走向廓大而明洁的人生目标的力量。尽管这是一个偏于一隅之地的“湖”,可它在汪曾祺心目中,却永远是“很大”的,它包容了一切“生”之义,也启示了一切“生”之义,他在一生中都会始终对它保持着“圣”的态度。一个在这样的圣境里长大的灵魂,将是怎样一个“知者”的精灵呢?汪曾祺没有讲,不过他郑重提出在“这里”出生的同乡先贤秦少游,王磐,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分明作了某些暗示。显然使汪曾祺“深深感动”的,不单那照临湖上的“紫色的长天”,更是“水”所象征或代表着的“人气调和”的化育之功。不用说,源于这种“天地之化美”的调和之气的感化,汪曾祺似乎在日后更加自觉地把握住了个人的精神规范。

汪曾祺说:“我追求和谐。”他在思虑人生如何臻于静美之境时,亦曾体会到动静的融合调和这一生命活动形式,并把它看作表现“入境”的写作秘要。其实,他那样以美的自适自足作为个体生存的终极性选择,和谐也好,调和也好,正是他思想个性的应有之义。在《受戒》和《大淖记事》等作品中,关注那种泯化了世间善恶悲喜的“人情之美”,关心人的本性的交流融入,乃是汪曾祺所谓“追求和谐”的具体内容。它不仅体现为一种写作的艺术意志,而且更主要反映了他看待世界、看待人类生活的内心尺度。或许,就在汪曾祺用“和谐”去规范“明子”、“小英子”和“十一子”、“巧云”们的生活时,他会一次又一次“沉沦”于“水的感觉”之中——这些水意淋漓的故事,即是最好的证明,而每一次“沉沦”,都将是对他自己心理品格和思想个性的一次强调。

于是,我们面前的汪曾祺,外表温雅和平而内质宽博融通。他会用明达的态度表现一种让现代人羡慕不已的家庭父子“其乐融融”的生活,像传统江南文人很早就注意的那样,汪曾祺是很懂得“人情”与“伦理”之间那种“情礼兼到”的协调融洽的微妙关系的:“春服既成,惠风和畅,我父亲这个孩子头带着几个孩子,在碧绿的麦垅间奔跑呼叫,为乐如何?我想念我的父亲(我现在还常常梦见他),想念我的童年,虽然我现在是七十二岁,幡然一老了。夏天,他给我们糊养金铃子的盒子。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块一小块,在合拢接缝处用皮纸浆糊固

定,再加两道细蜡笺条,成了一只船、一座亭子、一个八角玲珑玻璃球,里面养着金铃子,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爬,吃切成小块的梨,张开翅膀‘叫’。秋天,买来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瓢掏空,在瓜皮上镂出很细致的图案,做成几盏西瓜灯。西瓜灯里点了蜡烛,撒下一片绿光。父亲捣鼓了半天,就为让孩子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人们往往会以为“调和”有着多么深奥的精义,殊不知所谓“人情之常、出于自然”正是一种“调和”的表现。“人情”如此,以“人情”推及“物理”亦如此。汪曾祺回忆自己38年前,“无穷无尽地溜”昆明翠湖,颇有一点“园日涉以成趣”;他写道,翠湖成为“闹处寻幽”的城市林池的好处,便是有“人情味”：“一进翠湖,即刻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人们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可以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烟,四边看看。”他最欣赏的就是“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一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合适”者,正是用“人情之常”来加以衡量的。自然,汪曾祺生在有园林之胜的江南,看多了他家乡瘦西湖、小磐谷一类的“城市山林”,对江南园林造化 and 适的人文气息,有切近的认识。他是很能从江南文人园林的个性里,看出江南文人那种“城市山林”的“中隐”意识的。江南文人园林最突出的人文内涵就是可“隐”、可“居”、可“游”的统一。“隐”能躲避城市的喧嚣而致宁静;“居”则可以“山林”作“家池”而和适无虑;“游”即从“得闲即诣、随兴携游”里获得放松自由。江南文人热衷“城市山林”的用意很清楚:城市(世间)非常嚣闹,本难居处,然而深山旷野,虽远离城市,可毕竟太多冷落、太多险阻,亦难忍耐,因而“城市山林”正适合人的“乐逸无忧患”的调和性的日常生活。此即为“中隐”。实际上江南文人园林所体现的理想,正是一种使身心“安”与“全”的“归家”理想。就像张岱说的那样:“梦西湖如家园眷属。”这一切无不反映了江南文人以“人情”中庸调和为目的的人道情感态度。而汪曾祺写昆明翠湖的“合适”思想,不能不说是与江南文人园林的人文品格的同调,也是与江南文人那种中庸调和人道情感意识的同调。因此,他有一回,“行色匆匆”跑到新疆赛里木湖,初看此湖他就颇不安。因为那里的一切是有悖“人情之常”的基调的,他怎么也不能从那里得到宁静和谐地享受,这就大大违背了他的精神宗旨:

赛里木湖的水不是蓝的呀。我们看到的湖水是铁灰色的。风雨交加,湖里浪很大。灰黑色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扑面而来。撞碎在岸边,溅起白沫。这不像是湖,像是海。荒凉的、没有人迹的、冷酷的海。没有船,没有飞鸟。赛里木湖使人

觉得很神秘,甚至恐怖。赛里木湖是超人性的。它没有人的气息。湖边很冷,不可久留。

后来,在归程中再过赛里木湖,他终于看到了它的“蓝”。然而,这“蓝”叫他触目惊心,“蓝得奇怪,蓝得不近人情”。在汪曾祺的感受上,这样的“蓝色”,是属于神魔性的,而不属人间的,它只能使人凛然畏怖,不能使人温暖亲近。既然它如此神怪奇诡,全没有他习惯的那种可隐可居可游的调和气息,那么汪曾祺大概只能坚决地与它告别了。他的感觉和心理都必然要对赛里木湖产生抗拒——即使它也是“水”,可它又怎么能与汪曾祺心园的“水”,那个飘着炊烟的香味,响着女人孩子的应和声,有船,有野鸭,有夕阳,有珠光的高邮“西湖”相比呢?他要“回家”!

也许,汪曾祺以人的生活和谐为最高企求,因其所包含的中庸调和的人道因素,很容易被单纯纳入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去进行评价。即如有人指出汪曾祺是“一个具有中庸性格的儒家知识分子”,这样的见解很难说有什么不对之处,何况汪曾祺自己也认为他的主要思想是儒家的。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一见解在把汪曾祺的人生观与比它更大、涵盖它的儒家文化思想体系相“联结”时,毕竟还缺乏具体规则。这样的见解只反映了文化属性的一般形式:即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儒家文化思想体系有着整体上的属性关系,因此尽管见解正确,却有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它陈述了事实,同时也模糊了这个事实在当事人身上的独特性质。实际上,我们对汪曾祺的“和谐”思想——不论作为审美观点,还是作为人生观、世界观,需要深入了解的文化涵量应该更为具体,且更能突出其个人意义。

确切地说,汪曾祺的思想个性是趋向于江南文人所共有的中和性文化精神的,从这一思想个性出发,汪曾祺在写作中特别表现出他对完善人格的求取,并以此最终完成了他的理想主义的心灵历程。我们来看他的《钓鱼的医生》。它仍然是一篇与“水”关系密切的作品,因为它的主人公王淡人先生临河而居,这位小城名医几乎每天都在河边钓鱼: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的钓鱼的。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炭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钓鱼很有经验。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都三四寸长的鲫鱼。——这条河里的鱼以白条子和鲫鱼为多。白条子他是不钓的,他这种钓法是钓鲫鱼的。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

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地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钓竿上了。

仿佛只要汪曾祺的笔致一浸润到“水”，总是立刻能够精妙地“写”出人的神韵和心意。王淡人确乎当得上“人淡如菊”这句古诗。中国古诗可以造就后来许多人的名字，而古诗所代表的那种远播千百年的人格标准，却同时也造就了后来许多人的性格。汪曾祺仿佛就是从这一点生发开去表现“王淡人先生”人格的完善意义的。首先是王淡人独善其身的生活：“院里……有一架扁豆。还有一畦瓢菜。这地方不吃瓢菜，也没有人种。这一畦瓢菜是王淡人从外地找了种子，特为种来和扁豆配对的。”因为他很喜欢挂在医室里的一副郑板桥的对子“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故不能“名不符实”。“其实呢？何必一定要瓢儿菜，种什么别的菜不是一样吗？王淡人花费心思去找了瓢菜的菜种来种，可看出其天真处。”这样的“天真”对王淡人又何尝不是在“淡泊的风雅”里，体现出更生动的人格修养的“完善”内容。“他的一些穷朋友在来喝酒的时候”，“吃了王淡人自己钓的鱼”，能“尝到这种清苦的菜蔬”，不知云何感想，而汪曾祺恰恰把这一人生的细节看作王淡人具有真意的古贤之风的。其次是王淡人的“仁者爱人”之心。能“独善其身”是因为淡泊，而“兼能爱人”亦是因为“淡泊”，在王淡人的性格里，这两者是相互作用、互为表里的。有前者作基础，王淡人的“爱人”，既可以不顾生死危险，在洪流中铁链系身，去救治困在水里的孤村灾民；也可以不计世俗之见，把一个得了恶疮的“浪荡子汪炳”接到自己家里住，“管吃、管喝，还管他抽鸦片”，硬是不惜代价治好了他的病。“王淡人是有点傻”，他做的这两件“傻事”，并不是为了得一块“急公好义”的匾或为了“传名”什么的，在治好汪炳以后，“有人问王淡人：‘你干吗为他治病？’王淡人倒对这话有点不解，说‘我不给他治，他会死的呀’”。如此朴素的对人类生命的关心和爱惜——其对象无论灾民还是汪炳这个世人眼里甚为不值的人，亦即“仁”的本义了。“仁者”必定会“有点傻”的。王淡人明白这一点，汪曾祺更明白这一点。

汪曾祺终于从王淡人身上发现了他所希望的理想型人格，他禁不住要为自己的发现而击节称叹：

王淡人就是这样，给人看病，看男女内外大小方脉，做傻事，每天钓鱼。一庭春雨，满架秋风。你好，王淡人先生！

一庭春雨，满架秋风，既是《钓鱼的医生》的中心意象，也是汪曾祺为之欣赏、为之着迷的古老的文化意象和精神意象。

他的邑里，固多生性淡泊冲和、人格特立庄重之士。稍近一点说，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要算乡里士大夫文人的楷模了。王氏父子早年闻达，后退居乡里，是博通儒道的大学者。作为乾嘉学人，做文字考订学问，对他们父子显然是一种“隐世”方式，但他们又把这个学问看作用世的“实用”之学，此即所谓用出世的精神来做人世的事情，同时也以人世的行为达到出世的境界。这样的文化思路，恰恰说明了王氏父子（包括他们同时代的江浙一带的学者文人）如何从儒道两家思想观念的调和互补中，取得了人生的平衡和融洽的。汪曾祺对王氏父子的道德学问、敦厚宽和的人格崇拜备至，每每自称“后学”，想来绝非套语。只知道，他一面读王氏那些严谨精微的著述，一面看王氏（念孙）“行乐图”时，可见到一代大师临水垂纶的青竹钓竿上亦曾落过一只钢蓝色的蜻蜓否？

其实，据汪曾祺自己讲，《钓鱼的医生》里的“王淡人先生”，是参照着他父亲甚至还有祖父的形象来写的。这一点至少可以从汪曾祺的父亲名“菊生”，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日出生得到证明，他叙述王淡人时就特别着墨于此。从汪曾祺回忆他祖父和父亲的文章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乃祖乃父都有着淡泊风雅的“隐士”气（他祖父建了一座空亭，为的是“无事此静坐”；他父亲为自己取了一个隐逸味特别浓的别号叫“灌园生”），也同样有着重道义人情的淳朴仁厚的性格。汪家祖籍徽州，地道的江南世家。移籍高邮，汪曾祺的曾祖和祖父两代都得到过科举功名，到了他父亲，“在南京读过旧制中学”，那时“也算是功名”。汪曾祺的家，不是“寒门”，但也算不上高门世阀，只是一个洋溢着书香的文化家庭。他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小时候受到他祖父和父亲思想性格的熏染，也许由于徽州汪氏一族固有的通达开明、豁然宽和的家风，因而他在家庭环境里一直感受到的是温暖亲切的人情味，而他祖父和父亲那种对世事的旷达态度，对于生活的乐观趣味，以及济人及世的庄重素朴精神，尤给他深刻的印象。过去了这么多年，他已成为蹒跚老人，却仍保持着对过去美好一切的深深留恋，他实在是一辈子都要想念他的父亲、祖父的。他把他父亲、祖父的思想性格移到了“王淡人先生”（还有《徙》里的“高北溟”、《岁寒三友》里的“靳彝甫”等）身上，不只是为了释放他的想念之情，更在缅怀他父亲、祖父那一代文人的精神。尽管汪曾祺没有说明，但我们还是容易看出，他所寻求的理想的完善人格类型，早就经由家族的文化传统而模铸于他的内心了。

汪曾祺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内心要求。他从同乡先贤及他的父、祖辈们那里发现的人格类型，其真正含义却在于对自我人格向“完善”方向发展和定型的肯

定。事实上,就在这一发现一肯定的过程中,汪曾祺在自己的思想个性与传统江南文人的中和性文化精神之间融合了具体可靠的联结点,他最终理性地把握住自己的地方,便是由此为他“和谐”的人生理想形式确定了一个有力的支架。很明显,这种中和性文化精神,不仅反映在汪曾祺个人直接感同身受的传统中间,以及以儒为立身之本、以道为性情之求、中庸调和的先贤和他父亲、祖父身上,而且在更大范围内代表了江南文人文化的主要样式特征(注意,并非某种单独的文化价值系统)。唯其如此,如果说汪曾祺在他家乡的“湖边”体悟到的“调和”内容,构成了他个人精神的“自然气质”部分,那么他从人格完善化的自我追求中所汲取到的中和性文化精神,则构成了他的知性力的部分。当然,这未必是绝对可分的两部分,在具体的人身上,它们总是二而一的。

总之,汪曾祺在这个世纪末的历史、文化终点,开始思索人的生存所在的时候,他的确不大像一个充满了疑问的现代哲人,更显出一个温文尔雅的江南文人形象。

人们一般都认为,江南文人文化的神韵在它的“中和”精神。所谓江南文人崇尚“中和”之美,并不单纯指他们的美的意识,而是指他们整个思想风气及其传统。“中和”作为江南文人的理知标准和心理尺度,体现了他们平衡中允的文化价值观。因此江南文人文化的整体向度是融合性的,它由彼此不尽相同却彼此又能沟通的文化成分调和结构而成,其特点是宽柔而富有弹性。江南处于汉文化中心地带,历史的成因不容忽略之处,就在于它为文化生成划定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我们知道,江南文人文化传统的新源,是在一次政治变故下面由历史安排的文化大融合中形成的。那一时代,江南士阶级文人在文化思想上的调整,就是把自己从过分张狂放纵的老庄玄学拉回头,弥补这之前与孔、孟之儒过大的裂隙,也就是他们在强调个人的自然发展和实行自我节制中求得了新的平衡。等到江南士阶级文人讲究“礼玄双修”的学风时,便已说明他们的思想个性倾向于文化的化解;而佛教的适时掺入,则又以第三种文化力量,进一步改变了他们偏颇激烈的个性脾气,从而使他们的思想风度变得平淡而柔和起来。终于,江南文人文化在“缘情制礼”中显示了它的中和性精神特色。这些已经是十分悠久的事实了,说来,有这样的文化发展取向作规范,况且又有南方温和的山川风物时时点染,江南文人越来越能够在出世与入世、个人享乐与忧虑人生、消极退隐与积极有为、人格自由与矜持笃修、独善与兼爱、人情与伦理,等等相对的范畴,找到并设置人生的平衡点和归宿点。当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江南文人身上,往往会发